



孤注一掷： 现代体育的反兴奋剂斗争

——体育运动中的使用兴奋剂现象及反兴奋剂政策的制定

[英] 巴里·霍利亨 著 郑斌 译



人民体育出版社

孤注一掷： 现代体育的反兴奋剂斗争

——体育运动中的使用兴奋剂现象及反兴奋剂政策的制定

【英】巴里·霍利亨 著

郑 斌 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人民体育出版社

—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注一掷：现代体育的反兴奋剂斗争——体育运动中的使用
兴奋剂现象及反兴奋剂政策的制定/(英) 霍利亨著；郑斌译.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ISBN 978-7-5009-3232-1

I. 孤… II. ①霍… ②郑… III. 运动员-兴奋剂-问题-研究
IV. R8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6110 号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6 开本 18 印张 251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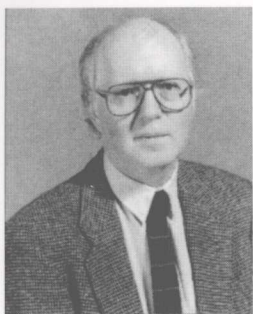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09-3232-1
定价：26.00 元

社址：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 8 号（天坛公园东门）

电话：67151482（发行部） 邮编：100061

传真：67151483 邮购：67143708

（购买本社图书，如遇有缺损页可与发行部联系）



巴里·霍利亨 (Barrie Houlihan) 是英国拉夫伯勒大学教授，曾任职欧洲委员会、欧盟、英

国体育理事会，多年致力于国际关系与政治、公共政策、体育管理和反兴奋剂研究。其主要著作有《体育、政策和政治》(1977)，另与安妮塔·怀特 (Anita White) 合著《体育运动的发展：发展体育还是靠体育发展？》(2002)。



挪威速度滑冰运动员约翰·奥拉夫·科斯 (Johann Olav Koss) 曾

荣获四枚冬季奥运会金牌。他是体育反兴奋剂政策的坚定支持者，退役后成为多个人道主义组织的成员，因出色地从事慈善工作屡次获奖。

前言

为了金牌和世界纪录，需要付出哪些代价？

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斗争是属于每个运动员的战斗。思想的尊严、人性的美德和公平竞争并非为奥林匹克运动所独有，而是被融入了体育的本质——激励运动员追求卓越。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凭借艰苦的训练、顽强的意志和一定程度的遗传优势成为冠军，与使用特殊手段获得金牌有着本质的区别。使用兴奋剂，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是令所有运动员不能容忍的行为。

有许多理由可以证明为什么禁止使用兴奋剂，甚至有更多的理由可以证明运动员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运动员都有权利在公平的赛场上参与竞争——经过与对手同场竞技，最终以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或表现最出色而获胜成为冠军。一切都是公平公正的，每个冠军都应该能够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功——“我刻苦训练，我理应获胜”，而不是暗自庆幸自己使用了违禁药物。任何运动员参加比赛时都不应当拥有与比赛对手不同的有利条件。这就是奥林匹克理想中的公平竞赛。为了使公平竞赛的理念成为自觉的行动而不仅仅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运动员必须面对使用兴奋剂的挑战。我们必须捍卫体育的荣誉和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

运动员是与他们同时代的儿童的行为榜样。儿童们时时刻刻将运动员当做自己崇拜的偶像，赞叹运动员的力量、勇气、决心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的镇定自若。儿童们仿效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参加体育运动，模仿他们的比赛方式，渴望成为体育明星。从某种意义上讲，运动员必须为自己的形象负责，必须考虑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赞助商、运动协会、体育迷，特别是那些为他们的胜利欢呼喝彩的青年和儿童造成何种影响。期待运动员做出良好榜样的观念或许看起来有些陈腐，但一个人确实有义务引导年轻一代走上健康的道路，并教会他们以何种方式获得成功。通过公开表示反对使用兴奋

剂、赞赏追求卓越和公平竞赛的理念，我们可以为我们的青年奉献出自己的关爱，使他们打胜反兴奋剂这一仗。

人们可能会指望兴奋剂对健康的危害能够使运动员望而却步，因为有害和危险的化学药品会侵蚀他们原本优异而矫健的体魄，可能会结束他们的运动生涯，甚至使他们送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些运动员每天都在冒险服用违禁药物，看来他们为取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不管是心脏病还是高血压。通过参加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工作，运动员有机会进行自我教育，进而将违禁药物危害健康的知识传授给其他人。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决策过程，如今运动员不再仅被看作运动场上的佼佼者，他们还可以成为今天和明天的世界领导人。在做有关运动项目发展的决定时，运动员拥有更为重要的发言权，年轻人将他们当作行为榜样。运动员有自己的主见，但我们也愿意倾听公众和世界上年轻人的声音。我们拥有进行有效变革的力量——整肃清洁我们的运动场，以追求卓越、尊严和公平竞赛的精神参加每一次比赛。运动员在所有的比赛中都期待获胜，除非需要为胜利付出得不偿失的巨大代价。运动员不能孤注一掷、搏命求胜！

约翰·奥拉夫·科斯

约翰·奥拉夫·科斯，挪威人，曾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在文中阐述了兴奋剂对运动员健康的危害，以及运动员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呼吁运动员在追求胜利的同时，也要注重健康和公平竞争。文中还提到，运动员可以通过参与决策过程，成为世界领导人，并为年轻一代树立榜样。最后，他强调了整肃清洁运动场的重要性，并呼吁运动员在每一次比赛中都追求卓越、尊严和公平竞赛的精神。

目录

第一章	体育的价值	(1)
第二章	使用兴奋剂的发展演变	(31)
第三章	禁用物质与禁用方法及其作用	(67)
第四章	体坛之外的药物滥用及相关政策	(115)
第五章	阐释难题：使用兴奋剂的道德观	(149)
第六章	反兴奋剂政策的演变：问题与答案	(183)
第七章	政策的统一：问题与前景	(225)
第八章	未来的反兴奋剂政策：问题与挑战	(253)

第一章

体育的价值

奥林匹克

跑道上迸发出速度的较量，

男人的力量在拼搏中激扬。

荣誉将与获胜者终生相伴，

幸福的回忆甜过醇蜜琼浆。

——平达尔^①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现代体育的典型缩影。为竞争奥运会主办权通常要进行三年或四年的准备，一旦申办成功，主办城市就要进行为期六年或七年的规划和建设。数以百计的电视公司参与对奥运会的转播报道，数以万计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参加奥运会，数十亿人从遍布全球的各个地区通过电视观看奥运会赛事转播，这充分证明了现代国际体育的吸引力、普及性和全球覆盖率。然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奥运会宏大的规模。通过奥运会的举办，还可深入观察体育如何控制大众的想象力。回顾最近两届或三届奥运会上最令人难忘的赛事，可以发现许多丰富多彩的情感画面：胜利与绝望，不期而至的成功与出乎意料的失败，以及令人屏气心跳的好运和令人悲痛欲绝的背运。

这一系列的形象和情感，在任何重大国际体育比赛——足球世

① *Odes of Pindar*, translated by R. Lattimore,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平达尔 (Pindar, Gr. Pindaros), 公元前 522~443 年, 古希腊抒情诗人。
——译者注

界杯、残疾人奥运会、环法自行车赛和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都可以看到。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我们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在为数众多的各种体育运动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形象和情感，只是这些参加者获得体育成就的抱负没有那么强烈。参加体育运动的共同经历，在奥运会金牌获得者雷德格雷夫（Stephen Redgrave）和平森特（Matthew Pinsent）与参加星期六下午划船赛事的大学选手之间，在奥沙利文（Sonia O'Sullivan）、加布雷西拉塞（Haile Gabresilasie）、格罗杰（Hicham EL Guerrouj）与参加柏林马拉松赛的长跑爱好者之间，在菲戈（Luis Figo）和巴蒂斯图塔（Gabriel Batistuta）与成千上万参加星期日上午足球联赛的业余选手之间，建立起一条强有力的联系纽带。除了全世界千千万万参加体育运动的人，还有数量更多的人通过在现场观看比赛或通过传播媒体特别是电视，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心灵震撼。

大众如此广泛和深入地参与体育运动，以及由此给体育运动参加者和观众带来令人惊异的深度激情体验，这仅仅是证明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占有独特地位的部分理由。体育在当代世界的特殊性还基于这一事实，即体育是全球传媒合作协定的奠基石，而这又是一个颇受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此外，现代体育还具有非同一般的融合功能，它一方面体现出与昔日传统的众多联系，另一方面又使人相信，它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体育与昔日传统的紧密联系，特别是通过奥运会，不断为人们的一种关于延续性的设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很多人都相信终究有一天，体育会像昔日那样纯洁，不像现在这样受到过度商业化、职业化、暴力和滥用药物的玷污。现代奥运会的奠基人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认为，古代奥运会是为人类提供深邃和强烈的灵感的源泉。荷马（Homer）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关于古代奥运会的描述，绘声绘色地交替展现了武士精英所获得的运动成就和盛大体育庆典的场景，而这正是古希腊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诗人荷马还通过对运动会和竞技项目的描述，将一种追求强健体格与杰出智慧完美结合的文化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强调灵魂与肉体的同步发展建立在这样一种信

仰之上,即真正的卓尔不群不仅应当拥有勇猛矫健的身躯,还应具有道德和智慧的品质,而这种信仰又孕育于“一种起源久远的思想和人生哲学”^①。这种思想和哲学至今仍在我们当代世界中产生共鸣,并且极为清晰地反映在《奥林匹克宪章》之中。正如麦金托什(McIntosh)的评论,“在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所生活的时代,体育无疑是高尚的”;但他还对这一事实表示关注:在后来的岁月中,“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其他泛希腊节庆的宗教和文化功能,未能得到清晰而充分的体现,于是便毁灭于专业化和商业化”,而且“在奥运会上取得胜利,沦为为各城邦和参赛者们达到其狭隘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②

那些阅读过古代奥运会历史的人,常怀有保持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之间的延续性的愿望。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强烈的倾向,即认为现代体育可以列在正常社会之外,或者至少是在社会中占有着特殊位置。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与暧昧和妥协的世俗社会本性以及政治和商业行为相比较,体育是当代世界“沙漠中的绿洲”,体育界奉行较高的道德标准,而这些标准常被视为后维多利亚时代浪漫主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产物。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这一信念:体育界内部不仅存在着可常见于更广泛的社会圈子中的价值观,而且在竞技体育中还认同“公平竞赛”和“参与比获胜更重要”的规诫。有人强调体坛的头等要义就是规则至高无上和严格执行规则,以此作为对这一论断的补充。现代体育的组织运作主要建立在严格的天才培养体制之上,远非依靠“训斥、严管和压制”^③的方法来培养运动员;以度量值为评判标准,不仅能确保跳得更高、跑得更快、投得更远的运动员在比赛中获胜,还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套从歧视和偏见中解放出来的、清晰和透明的竞争规则。

① Segrave, J.O. & Chu, D. (eds.), *The Olympic Games in Transition*, Champaign, Ill: Human Kinetics Books, 1988.

② McIntosh, P., *Sport in Society*, revised edn., London: West London Press, 1987, pp. 20 and 22-23.

③ Brohm, J.-M., *Sport, A Prison of Measured Time*, London: Pluto Press, 1978, p.112.

如果说仰慕更高的道德标准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占有与众不同的地位，那么年代久远的业余化和杰出运动成就之间的联系，也为此作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在大多数欧洲和北美国家，对体育业余化的推崇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占据着统治地位，并给当代体育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烙印。对许多人来说，对业余化的一种诠释——旨在捍卫竞技体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使其避免据信是奖金带来的腐败——加强了他们认为体育代表更高的道德价值的固有观念。

不幸的是，上述关于现代体育和古代体育的观点都有许多谬误之处。秉性温文宽厚的人可能会提出：那种认为现代体育的简单而直接的价值就是可为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提供样板的观点，不仅源自未全面研读古希腊历史，还在于浪漫化地理解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中捍卫体育业余化者的动机。言辞尖刻且思路更为敏锐的人会辩称：在早期奥运会的历史中，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们寻求的基本原理，就是将他们所喜爱的体育运动模式合法化，而这些运动模式，又是专为维护享有特权的有闲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利益而设计的。无可辩驳的是，一个社会所创建出的体育模式，是彻底脱胎于该社会的商业和政治体系的产物，而该社会的商业和政治体系又是更深层次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观念的产物。然而，这种体育如同商业和政治一样都是社会产物的论断，无意贬低许多置身体育圈子的人所拥有的愿望——追求一种通常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并不多见的价值观。如果认为体育可以在培养社会道德方面作出贡献，那就是一种坚持以乐观主义看待人性的观点，并且相信体育和重大体育赛事能够在当代变化纷繁的世界中真实展现高尚的道德标准。就体育所面临的严重挑战而言，为在竞技体坛消除使用兴奋剂现象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就是最好的例子。反兴奋剂斗争，可以看作是对世界体坛上各个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的道德诉求的“酸测试”。不言而喻，是否确实有道德诉求以及这种愿望是否强烈，必须通过分析真凭实据来考察，而不能仅听其信誓旦旦。

将近期伴随重大体育赛事发生的一些事件选录在一起，可以充

分清体育和兴奋剂事件在当代世界中处于何等位置。第一个事件与6名芬兰滑雪运动员有关，在2001年2月于芬兰拉赫蒂举行的世界滑雪锦标赛上，他们在兴奋剂检查时血检结果呈阳性（血液中红细胞含量超标），因此被禁赛两年并被剥夺了已经到手的4枚奖牌，其中包括芬兰男子队获得的接力金牌和女子队获得的接力银牌。在这些被禁赛的运动员中，有总共获得过13枚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奖牌的米吕莱（Mika Myllyla），以及芬兰体坛英雄之一、获得过6枚奥运会奖牌的基尔韦斯涅米（Harri Kirvesniemi）。使得该事件备受关注的不仅是这些运动员的名人身份，还有另外一些原因：首先，是在反兴奋剂方面一向领先的芬兰的国家名誉；其次，是这些运动员的辅助人员中的一些人也受到了处罚。芬兰国家滑雪队总教练以及男队和女队的教练员都被免去职务，并受到终身禁止执教的处罚。此外，与该事件有牵连的两名医生也受到了芬兰医学协会的警告。或许该事件最引人注目的一点，还在于当第二例阳性结果被公开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对芬兰国家队所剩29名队员中的27人，实施了事先不通知的突击兴奋剂检查。作为对此次兴奋剂检查阳性事件的反应，芬兰政府宣布将重新审查对芬兰体育管理机构的财政拨款额度，而赞助商们也宣布，他们也要重新考虑是否会为芬兰滑雪协会提供商业资助。

这一事件一方面充分表明，任何国家，无论其政府和体育管理机构怎样承诺致力于“无药物体育”，都无法避免兴奋剂问题的困扰。卷入该事件的6名滑雪运动员中有几位属于国家的体育英雄，但他们还是制造了令芬兰举国震惊的丑闻。在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确实凸显出许多使“无药物体育”的支持者们受到鼓舞的积极影响：第一，果断处罚了因参与使用兴奋剂事件而负有部分责任的运动员辅助人员——几名教练组成员和医生；第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干预进一步表明，这个新生的组织已在参与悉尼奥运会的过程中锻炼得羽翼丰满；第三，政府的态度——宣布要由本国体育管理机构对其运动员的行为负责；第四，赞助商们表示反对这种不光彩的行径。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4名俄罗斯运

动员（短跑 1 人、游泳 2 人、摔跤 1 人）被检测出布罗曼坦阳性。布罗曼坦这种物质是专为帮助苏维埃士兵在阿富汗战争中消除疲劳、振作精神而研制的，它不仅具有刺激剂的作用，还可以用作掩蔽剂来掩盖其他药物的痕迹。国际奥委会（IOC）最初的决定，是收回摔跤运动员古利耶夫（Zafar Guliyev）获得的铜牌，并表示要对获得游泳比赛铜牌的科尔涅耶夫（Andrei Korneyev）给予类似的处罚。但是，俄罗斯人采用了抗辩的法律程序，他们在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提交上诉书时未否认使用药物，也未指责实验室检测分析时出错，而且更未使用任何其他被检测出阳性者惯用的辩护托词，只是简单地争辩：布罗曼坦不是一种禁用物质。俄罗斯代表团的申辩获得了胜诉——国际奥委会的决定被推翻，俄罗斯人的两枚铜牌失而复得。虽然国际奥委会认定布罗曼坦是一种刺激剂和掩蔽剂，但其立场还是产生了动摇，因为在举办亚特兰大奥运会时，布罗曼坦尚未被列入禁用物质清单。1997 年 2 月，国际奥委会的禁用物质与禁用方法清单中增加了布罗曼坦。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补救措施对于处罚使用布罗曼坦获得摔跤和游泳两枚铜牌的俄罗斯运动员来说，已经为时过晚。这一事件使人们注意到：必须建立一种快速和有效的程序，以便毫不延迟地将新确定的违禁药物增补进国际奥委会的禁用物质清单。但这一事件特殊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出了运动员们和体育官员们究竟以何种态度来对待国际奥委会的反兴奋剂政策方针。国际奥委会的反兴奋剂规则显然是被看作取得比赛胜利的障碍，而未被视作奥林匹克价值观的化身。当澳大利亚海关总署的官员宣布，在 2000—2001 财政年度中，他们创纪录地查获了 1268 起走私可提高运动能力药物的违法案件，而其中 44% 的案件发生在 2000 年 7—9 月中旬悉尼奥运会开幕这段时间内时，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兴奋剂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距今更近一些类似事件发生在 2001 年加拿大埃德蒙顿世界田径锦标赛上，该事件进一步暴露出制定有效的反兴奋剂政策所面临的难题。2001 年 7 月，运动员叶戈罗娃（Olga Yegorova）参加国际田联黄金联赛巴黎站 5000 米比赛时，被查出促红细胞生成素

(EPO) 阳性。但由于法国反兴奋剂管理机构在采集 1 份血样外加 1 份尿样时出现失误, 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 (IAAF) 后来宣布阳性检测结果无效。因此叶戈罗娃就有权参加 5000 米决赛, 结果她一举夺得冠军。与前面所提到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这次在尿样中检测出的药物毫无争议地列在禁用物质清单之中, 但谁料殊途同归, 管理方面的缺憾再次妨碍了对涉案运动员违禁行为的彻底调查。叶戈罗娃的事例充分说明了当前反兴奋剂程序技术上的复杂性, 并对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提出了风险警告——有些愤愤不平的运动员可能会提起诉讼, 告上法庭。

围绕使用兴奋剂问题产生的是非和丑闻, 不仅限于奥运会或重大的田径比赛, 作为世界主要运动项目之一的自行车运动也深陷其中。法国警方在 1998 年环法自行车赛期间搜查菲斯蒂纳车队的运载车辆后出具的调查报告, 特别是法国自行车名将维朗克 (Richard Virenque) 和菲斯蒂纳车队的医疗护理师沃茨 (Willy Voets) 后来在审讯中的证词, 为揭露该项运动中运动员滥用兴奋剂的内幕, 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法国警方通过调查, 将维朗克、沃茨、菲斯蒂纳车队的经理鲁塞尔 (Bruno Roussel) 和该车队的公关经理夏布里昂 (Joel Chabrier) 送上了法庭。维朗克在法庭上坦白招供, 因而免遭刑事起诉, 只被他隶属的瑞士自行车协会给予禁赛 9 个月的处罚。但其余三人因犯有提供和教唆使用违禁药物罪, 最终均被判处徒刑 (缓期执行) 和罚金。1998 年环法自行车赛事件本身颇具戏剧性, 但其真正的重要意义在于法国公共当局的强力介入, 这种干预在很大程度上表明: 一些国家的政府对几个主要运动项目的国际联合会越来越感到失望, 认为它们面对体坛沉溺于“使用兴奋剂文化” (例如职业自行车运动) 的挑战, 无法发挥表率作用, 明显表现得无能为力或勉强招架。法国人的行动促使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展开了类似的同步调查, 而更大的成果是解除了某些国家政府心存的顾忌——不愿“干预”媒体曝光度很高的自行车比赛。1999 年, 意大利的顶尖自行车选手潘塔尼 (Marco Pantani) 由于兴奋剂检查时血细胞比容过高 (表明可能使用了 EPO), 被驱逐出环意大利自行车赛, 随后发现他犯有“体育欺诈罪”。在两年之后的环意大利

自行车赛上，住有参赛车手的圣雷莫几家旅馆突然遭到警察的大规模搜查，结果发现了已引起公共当局高度关注的、有关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使用兴奋剂的更多证据。

经过作者精心挑选的上述这些事件，有助于描绘出当代高水平体育的本质和形象——一种以高度的商业化和职业化为特征，令政府和公共当局越来越感兴趣，并被许多运动员将“获胜比参与更重要”奉为最高信条的活动。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运动员意欲通过欺骗手段来获取比赛胜利或保持参与高水平比赛的竞技能力。若将现代体育的这些特征，看作是某种程度上的有失高雅和道德沦丧，那就显然属于过于浪漫化的厚古薄今。正如将在本书第二章中所讲述的，使用兴奋剂的现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后面几节的内容旨在辨析产生体育、使用兴奋剂现象和兴奋剂检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中的主要因素。只有通过现代体育的形成和发展演变的理解，才能对我们所面临的关于制定和实施有效反兴奋剂政策的难题给予正确评价。

体育、政府和民族主义

有一种很能迷惑人的观点，就是将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介入体育与冷战时期相提并论。在西方国家还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政府控制操纵体育的现象仅见于前共产党国家。这两种论点不仅都是错误的，而且还会产生误导——政府插手体育是近代才有的现象。实际上，政府介入体育的历史可能与体育自身形态的诞生同样久远。芬利（Finley）和普莱基特（Pleket）在他们对古代奥运会的评论中指出，那时“对于采用何种手段来利用人民对竞技运动和胜利的激情，借以达到广义的政治目的，没有任何限制”。^①他们给出的例子之一是，统治者希望通过与获胜运动员的交际来往提升自己的显赫地位，这种愿望有时会导致企图“购买”最优秀的运动

^① Finley, M.I. & Pleket, H.W., *The Olympic Games: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6.

员，或策动他们“改换门庭”。这等做法如今已拥有其现代翻版，例如，已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受到鼓惑改变国籍。南非运动员巴德（Zola Budd）在打破纪录时被授予英国公民身份，以便能代表她的新国家参加国际田径比赛。此外还有一些例子，如出生于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以土耳其国籍参赛；出生于苏丹的运动员以卡塔尔国籍参赛。2000年，前摩洛哥运动员穆尔希特（Mohammed Mourhit）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世界越野锦标赛上为比利时赢得5000米铜牌后，与其前队友希索（Salan Hissou）一起身披摩洛哥国旗，摆好姿势合影留念。

政治家利用成功的体育赛事或利用明星运动员的其他例子，还包括招募优秀运动员出任形象大使，以及利用在奥运会上取得的运动成就为其未来的政治生涯捞取资本。西班牙皇室直接参与巴塞罗那奥运会；科尔（Helmut Kohl）1996年亲临伦敦温布利体育场观看欧洲足球锦标赛德国队的一场比赛；爱尔兰总理豪伊（Charles Haughey）亲赴巴黎，迎接罗奇（Stephen Roche）冲过终点线赢得1987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了古希腊人历久弥新的理念——与成功的运动员联络交往可提升政治形象和社会名望。英国政府在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1英里跑的成绩突破4分钟大关后派遣他环游美国，就是战后利用功成名就的运动员作为形象大使的许多事例之一。

许多国家的政府除偶尔进行干预以调控体育外，其对体育的大部分一如既往的参与都体现于对学校体育的资助。过去很长时期以来，只有极少数国家的政府将学校体育看做更庞大的体育战略的一部分。对大多数国家政府而言，学校体育的定义取决于它与教育内容的相互关系——事实证明，教育课程中之所以包括运动和身体教育，是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培养纪律观念和塑造“性格”，还有益于学生的健康和卫生。相比之下，一些国家的政府只是在最近才为体育和娱乐提供资金，这是由于对国家的任务有了更为宽泛的理解——超越原有的对体育进行调控的概念，承认体育（和娱乐）是发达社会中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甚至是像美国这样在传统上政府仅具有

有限职能的国家，政府对体育和娱乐业给予资助已经逐渐得到认可。在欧洲和北美洲，地方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大了对体育设施的投入，而且，从业人员的不断增长，说明体育和娱乐是地方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国家加大对体育和娱乐业的介入，是国家任务的概念不断扩大的结果——接受了总职责中应包括生活质量和更广泛的福利定义。在民主国家，选举区是否拥有高质量的体育设施以及国家在国际体坛取得的成就，都已成为各政党和体育利益集团是否能获得公众支持的有吸引力的因素。

在某些国家，地方对体育和娱乐投入的持续增长通常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批准，而不是因为增加投入的直接刺激。但对许多国家来说，中央政府对地方投入的经常性干预，起因于将这种投入定义为：可用来解决一些特定的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的有用的政策工具。在许多西欧国家，体育已被作为暂时缓解包括失业、青少年犯罪和社会断层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良药。例如在英国，体育已被看作解决“休闲问题”——因战后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男性青年而产生，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享受着较高的薪金但却每周工作时数减少，从而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的方案之一。

近 50 年来政府与体育之间关系的最显著变化，在于前者已从偶尔干预体育转变为全面介入，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如今政府已成为体育运动的基础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对大多数政府来说，体育仅可算做一种偶尔吸引注意力的边际兴趣，尽管有时也会强力介入，就像解决诸如城市骚乱、城区出现疫情或军事需求等特殊问题一样。政府进行干预，很少是因为承认体育和娱乐需要一种特殊的政策。不过，大多数国家都有一系列可以旧事重提的论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政府的干预政策在步调和特征方面的延续性和相似性。

涉及政府干预体育的一个论题，就是由政府来决定开展哪些运动项目以及什么人可以参与这些项目。昔日常常假借博爱主义的名义，用立法的形式来保护阶级特权和财产权。在 17 世纪的英格兰，